

被评为校级“学风优良班”。事实说明，这个班的教学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作为一名开拓者，为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走上“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结合，综合创新”的学术发展之路，作了巨大努力和一番探索。

2010年6月16日是端午节，也是葆耕的73岁生日，可惜他未能越过这一“坎”。6月11日，我同宝寅及其夫人、兼斌、自学、小宁相约，并邀葆耕夫人高敦复一道，前往“天寿园”陵园，为长眠于此的葆耕扫墓并提前给他过生日。当天，我并未像通常那样买菊花，而特意买了一束葆耕钟爱的淡紫色小花“勿忘我”，敬献于他的墓前。约在十年前，我曾读过葆耕写的一篇文章《小五爷园里的“勿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列举了清华建校九十周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所涌现的一些“美文”，如诗歌、散

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他认为，“美文只是一些如‘勿忘我’那样的小花，而她却是一所大学文化灵魂的外在标记”，“这些花扎根在清华园的土地上，目睹或经历了九十年的沧桑巨变，却不足以承载过分沉重的政治内涵。她们的价值在另一方面，即点点滴滴地闪着清华人心灵的虹。她们是一些心灵之花，是肺腑之声，其中还有些是用血浇灌出来的。如果你想窥视清华的人文底蕴，也许这些美文比史书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葆耕“作为一个从理工科横跨进文科的闯入者”，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写出如此多的美文，在如我等“弃工从文”者中，堪称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他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张扬，更不自傲，把他和他的作品比喻为紫色小花“勿忘我”，我想他会乐于接受。因此，我献上一束“勿忘我”他也定会笑纳。

## 求学四年忆宗师

○王伯惠（1944土木）

前年我曾写了一篇与本文题目相同的缅怀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多位教学宗师的文章，在2008年4月份《西南联大简讯》第43期刊载。限于时间和篇幅，还有几位负有行政责任的老师没有写。现在欣逢清华一百周年校庆，谨继续完成，以作纪念。

### 张泽熙师

泽熙师是土木系当时最年长的教授，1941年夏我复学到土木系二年级

时，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面微黑黄，带一付黑框眼镜，稳重安详，平易近人，是广受同学们尊敬的长者。那时抗战中期，生活困难，尤其昆明，地处大后方唯一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起点，市面繁杂，物价飞涨，众多学生尤其沦陷区来的学生都要靠教育部发的助学金生活。当时工学院有生活指导委员会，由泽熙师任主任，学生申请助学金，皆须他签字。我虽然家在四川，但在一个山区贫

## □ 师友情

困小县，家境贫寒，也申请了助学金，得到张师签字，上报批准。

泽熙师教铁路工程学，不但理论精通，而且经验丰富。听说他曾开讲土木系所有道路、铁路课程。工学院当时在昆明拓东路，沿路不远即是昆明火车站，他常带我们到那里讲解铁路有关的设备、器材以及线路设计、施工知识，使我们了解透彻。例如道岔，使我们看到多种实物，才知其实际构造、功能和运作方式，实地教学，受益匪浅。三年级（1942—1943）时我和工学院几个同学阎安素（土木系）、陈炎创（土木系）、吴铭绩（电机系）、吴宝初（电机系）、张天玑（机械系）办了一个墙报“西南风”，主要以幽默的笔调，描述当年学生的艰苦生活和讽喻校园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同时议论当前抗战局势的发展。在创刊号上，陈炎创、吴宝初画有几幅关于学生生活的漫画，深受同学们的好评，其中一幅在食堂抢饭时一同学把眼镜挤掉在桶底的漫画，更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印象深刻。我也写了一篇短文，略道：

“听文、法学院的同学们说，听刘文典教授讲‘庄子’：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其中头一个是庄子自己，第二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至于我刘文典，只能算半个。但庄子本人并不全面了解今天的‘庄子’，因为其中只有内七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其余多篇都是后人托名撰著的，庄子本人并不知道。而日本那个学者却比我少看一本书，就是藏于大英博物馆里的那本研究‘庄子’的专著。其语言是如何的风趣，引人入胜！现在工学院成天拉算尺、考试，十分紧



王伯惠学长(左)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活动时，与他清华中学的学生、精仪系教师王则豪合影

张，如果每隔一个时期能请文、法学院的老师们来和我们讲一讲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或者分析谈论当前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前景，不是更好么？”文末署名“黄博位”。

过了几天，泽熙师找我去问，那文是谁写的，我据实回答就是我写的，我以为他还要严厉批评我几句，后来却一语未发，只是看我两眼，笑着说：“你回去吧！”我如释重负，退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院系调整，泽熙师调到唐山铁道学院。那时我在辽宁工作，我二姊和姊夫在唐院工作，我曾有三次去唐院探望二姊一家，包括“文革”中1973春节那次，我都到泽熙师家中看望。他的夫人据说是当年北平师大校花，当时他俩都身体健康，神采依旧，夫人还任唐院家属委员会主任，“文革”中皆未受到任何冲击。1978年

唐山大地震中也未受到损害，房屋也未倒塌，这是所谓“吉人天相”吧？

### 陶葆楷师

1940年暑期，我因母丧回四川老家休学一年，1941年复学到校，土木系主任是陶葆楷老师。陶师是市政卫生工程专家，江苏人，面皙白而红润，学生注册、选课、成绩等等都须通过系主任管理考核，日常接触较多。我学习了陶师的市政工程和给排水工程学，他讲课声音较细，说理清楚，娓娓动听。记得他谈到在美国念书时一位同学在街上走路，被人行道上的一小坑崴了脚，去医院治疗，并按美国法律控告该地主管政府未管理好道路状况，致使公民受到伤害，得到了赔偿金。还说有一次学校组织到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参观，厂长介绍全市污水都经过处理，回收使用，其中一部分还完全净化可供饮用，说着就从附近一个水龙头里放出几杯水来请大家品尝。陶师接着笑说：“我当时却未敢喝”，说得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他说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情况，我当时在想：苦难的中国何时才能达到这种管理和科技的发达水平？

建国初期我在辽东省交通系统工作，1950年我曾和陶师写信希望能回到清华从事研究工作，后因抗美援朝军兴，未果。1953年停战后我又写信，陶师答我：如能离开，可以安排。后来听北京同学说当时把我的宿舍都安排了。房门口已挂了我的名牌，但因停战后各条战线大规模建设开始，工作繁忙，单位不放，而未成。

1986年，辽宁省桥梁学会联同市政工程学会等在沈阳召开公路立交工程学

术会议，我们邀请在美国从事公路工作的联大同级校友王德硕回国参加，到达北京时我去迎接，并住京两天，共同回清华探望了陶师和施嘉炆、吴柳生等旧日师长，陶师神采奕奕，风度依旧，深感欣慰。

### 施嘉炆师

施师当时是工学院院长，水利专家，他是福建人，但讲一口普通话，应当是幼年即入北平清华学校学了八年之故。三年级时教我们水文学，授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剖析精微，讲解透彻，深受同学们欢迎。建国后我接触不少水文问题，例如我从事的公路桥梁工作，关于河流的流量计算、桥长决定、由桥孔压缩引起的背水高度、桥墩冲刷等问题，皆须精确计算决定；又如“文革”后期1969年，我全家下放到昌图县农村走“五七道路”，三年后定岗到县水利站，从事水库管理，沿山坡修建数十公里长引水灌渠等工作。在进行水库调节、灌溉流量、水账计算等方面都要作大量的分析工作；由于我在校时已有翔实的水文学基本知识，触类旁通，各种水文问题自然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那时工学院以施师为首常帮助当地政府进行水利建设等事业。1942年初夏，承担了云南省政府下关洱海水电站的测设任务，抽调土木系水利组助教曹乐安（队长）、刘俊潮、谢旭华和二年级学生陈炎创、陈濂和我共同组成勘测队前往勘测。我们三个同学负责环海的水平测量，然后又参加洱海的水文测量，历时月余，终告完成。这时已是5月初，日寇侵滇入滇，快速部队直达怒江惠通桥，滇西陷敌，昆

## □ 师友情

明震动，我们也即返回昆明。云南地处偏远，技术落后，当时工学院教学之余发挥潜力，帮助地方政府开发经济，实为一举多得之计，后来并发展成清华服务社，所得收入，还可略补当时学校以及老师、学生艰苦生活之不足。施师当时此举实为十分英明的决策。三年级暑假，我又和同级同学顾子政被派往昆明附近的呈贡军用飞机场参加建设，这都是清华服务社得来的任务。

1944年初，工学院布告牌上贴出了驻印军新38师征求土木、机械、电机学生各5人，去印度军中担任翻译和技术工作的事。当时得知，该师师长孙立人是施师清华学校的同级同学。他的部队于1943年10月正式由印度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敷设中印油管，亟须翻译和技术人员，因此来电直接和施师联系。不出一星期，土木系我和张世斌、载祖德、孙致远，机械系宁奋兴、陈柏松、曾善荣、江今俊、方为表，电机系蒋大宗、吴铭绩、费纪元、李桂华、李循棠、梁家佑连续到院里报名额满，于1944年2月16日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跨越驼峰，前往印度列多参加了驻印军新38师。

孙立人在台湾被幽禁33年后，于1988年3月恢复自由，台湾报纸采访他，逐日连载他的《回忆录》得稿费8万美元。他一生安贫，原拟不收，后接受原部属随身参谋潘德辉的建议，用作台湾新竹清华、台大几个大学土木系和体育系的奖金，同时也给母校北京清华一个名额，每年台币2万元，约合人民币4000元，委托施师经手。施师认为根据大陆情况，此数太高，建议分为五个名额。1990年11月孙立人

逝世，1991年4月26日，清华80周年校庆时，孙长子安平由潘德辉陪同到北京，于27日晚由施师主持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典礼，颁发第一次奖学金。可惜当时我出差在广州，未能前往。

1990年清华校友告知募集施嘉炆奖学金，我当时略尽绵薄，捐献1000元。不料不久即得施师来信，寄赠与师母合拍的玉照一张，并致谢意。我哪里敢当，真是折煞愧煞。施师当时已近90岁，终生在清华从事教育，育才育人，我等学生亲聆教诲，终生不忘，实报恩难尽也。

那些年我一直在广州工作，直到2002年春节才回到沈阳，看到《清华校友通讯》，才知施师已在2001年底仙逝。他享年100岁，是清华教授中的一位老寿星。

### 梅贻琦校长

我1939年秋入学昆明西南联大，因校址十分分散，很难举行全校学生集会，因而也很少看见梅校长，我只两次有幸得识他的风采。

第一次是在1940年五、六月间，当时学校的学生会准备在新校舍的学生食堂演出话剧来欢送当届毕业生，为此专门印发了入场票。可是，住在新校舍的一年级同学却一张票也未得到。那是抗战中期，物价高涨，生活昂贵，学校学习紧张，平常很少有文娱活动。这次演出，住在旁边的一年级学生都无缘参加，不但令人失望，而且引起公愤。演出当晚，一年级学生约一二百人聚集在会场门口，待有入场券的观众都进入之后，看见场内后面还空了几十排座椅无人，就一齐拥入场内坐



下，我也在其中。这时台上的主持人自然发话，批评拥入者不守校规，违犯纪律，应当退出。那晚正好张伯苓常委也前来参加，在讲话中告诫同学们应循规蹈矩，遵纪守法。这时，我同一个宿舍的薛星儒忽然站起来，他是蒙古保送来的政治系的学生，说：“张常委训斥我们了，我们也知道做得不对，拥进来的同学们大家都退出去吧！”说着他带头退出，大家也就跟他一起退了出来。大家一路走一路议论，越说越气愤，有位同学说：前面路边就是电灯开关室，不如把会场电灯关掉，谁都看不到！大家随声附和，于是七八个人走到开关室，把总开关闭了。以后自然全校舍一片漆黑，几个人借着星光回到各自宿舍，互相之间谁也不认识，面貌也看不清楚。

过了几天，学校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广场召集一年级学生开会，由训导长查良钊主持，梅校长讲话，动员带头的学生主动到学校说清情况。我这是初次见到梅校长，他穿一件蓝布长衫，面色白润，黑框眼镜，语言缓慢，有一种特别的语调，完全是一位饱学学者、慈祥长者的风度。讲完之后只有一位女同学在人群中举手要求发言，我站在远处，既看不见，又听不清。后来就散会了。不久放暑假，我搭黄牛车回重庆为母奔丧，又因患隔日症，只好请假休学一年。待1941年秋再到昆明复学时听同学们说，那次演剧的事后来闹得很大，重庆专门派康泽到昆明来调查处理，怀疑是“异党活动”，还要抓人。其实是因为发票不当，引起公愤，年轻学生一时冲动造成的。

大概是1942年冬季，工学院布告牌贴

出通知，要大家去新校舍听报告。我们走十多里路，正好能赶上9点开会，会场仍是图书馆前那个广场。到了才知是教育部长陈立夫来到昆明。梅校长仍穿蓝布长衫，先作简短介绍，然后是陈立夫讲话。他留一个平头，浓重浙江口音，听的学生很多，我站得很远，又在露天，没有扩音机，听不清讲了些什么。

1946年4月，我随军到东北，6月退伍，8月和一批联大从军退伍同学到鞍山创办东北清华中学。这时西南联大已搬回北平，三校各自恢复，我专程到北平招聘联大文史科毕业校友到鞍山任教，并回到清华向梅校长汇报学校情况。到清华后，问明梅校长办公室地址，未经任何人事前联系，就直接前往，敲门而入，室内没有什么铺张的家具布置，只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靠窗放置，梅校长仍然是身穿蓝布长衫，坐在一侧的椅子上，让我坐在另一侧的椅子上，面对面谈话。梅校长倾听了我的汇报，十分高兴，让我转达他向创办人孙立人校友的致意，并说：“如以后有师资、教学等方面的困难，清华可以尽可能地帮助。”最后还笑着幽默地说：只是经费帮不了你们的忙！我也笑着感谢，起身鞠躬告辞。一看表，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1947年暑期我去北平增聘教师，再一次回清华晋见了梅校长。我汇报了办学一年来的情况，提到：东北地区日伪统治14年，年轻学生接受祖国教育，学习祖国文化，情绪十分高涨，有不少成绩十分优秀的，希望能给予三个毕业生保送上清华的名额，以兹鼓励，梅校长当即嘉许。那是跟梅师的最后一次相见。